

北京文史资料

第60辑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北京出版社

《北京文史资料》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舒 乙

编委会副主任：弥松颐 贾凯林
陶信成

编委会委员：王灿炽 李 甦
李滨声 张 洁
陈平原 郑 潜
赵其昌 谢 方
蔡美彪 戴 贤
张秋萍

本辑执行编委：谢 方



·共和国脚步·

- | | | |
|----|-----------------|-------|
| 1 | 我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的部分回忆 | 徐树滋 |
| 6 | 开国纪念章唤起的回忆 | 刘向勃 |
| 11 | 中国评剧院近五十年发展轨迹 | 张玮 冯霞 |
| 26 | 北京中央国际无线电台设立经过 | 董兆龙 |
| 37 | 我为首次成功攀登珠峰传送信息 | 李长旺 |

·报业话旧·

- | | | |
|-----|----------------------|-----|
| 47 | 爱国维新报人彭翼仲先生 | 彭望苏 |
| 75 | 一名“小记者”的回忆 | 陈 泓 |
| 86 | 《人民日报》(北平版)的诞生 | 王 敬 |
| 103 | 从《人民日报》(北平版)到《北平解放报》 | 燕 凌 |
| 125 | 《北平解放报》稿件送审纪实 | 陶 涵 |

·人物春秋·

- | | | |
|-----|--------------------|-----|
| 128 | 现代美学家邓以蛰小传 | 邓稼先 |
| 135 | 邓以蛰老师留下的字画 | 赵 洛 |
| 140 | 在比利时访问陆徵祥 | 钱能欣 |
| 145 | 王芸生参加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前后 | 王 鹏 |
| 156 | 怀念阿兰·魏宁顿 | 叶 周 |
| 163 | 一代名医魏龙骧教授 | 魏金玺 |
| 172 | 我的朋友萧铜 | 常锡桢 |
| 177 | 我所知道的李景波 | 马铁汉 |

· 我走过的路 ·

- | | | |
|-----|----------------|-----|
| 181 | 在战火中成长的战斗剧社 | 严寄洲 |
| 203 | 从留学法国到为新中国外交服务 | 董宁川 |
| 215 | 我在北京工业学院的日子 | 沈沛霖 |
| 252 | 在苏联学习的回忆 | 李河民 |

· 京城寻旧 ·

- | | | |
|-----|-----------|-----|
| 258 | 漫谈老北京的桥 | 张润普 |
| 262 | 元大都发掘纪实 | 黄秀纯 |
| 272 | 京西玉河古道考察记 | 安全山 |
| 292 | 编后记 | |

我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的部分回忆

• 徐树滋 •

北平于1949年初获得和平解放，距今整整半个世纪了。虽然事隔年久，但作为见证者和参与者，我对当时亲身经历的一桩桩震撼人心的事件仍记忆犹新，岁月没法抹去我在革命战争年代时的追求与理想，忆往昔峥嵘岁月，心中总会荡起层层涟漪。在建国50周年之际，我想把我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参加地下党领导下的保护电台的斗争和参加开国大典的部分经历写出来，以示纪念。

我是一名技术工作者，长期从事无线电技术研究和使用。1945年我在辅仁大学物理系毕业后，于11月开始在北平广播电台所属的双桥发射台、西长安街增音室、黄村收信台等技术部门实习，然后在增音室值班班任值班员。1946年4月任北平电波研究所助理技术员，开始进行无线电传播研究工作。北平电波研究所、北平广播电台及北平广播器材修造所当时同属于国民党中宣部广播事业管理处。我所在的电波研究所西郊观测台当时设在复兴门外西郊什坊院村。

1948年初，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北平的学生运动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在共产党的宣传和学生运动的影响下，各领域都酝酿着迎接解放的斗争，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接受地下党的任务的。

最初同我有接触的中共地下工作者是北平地区城工部学委的苏士文同志。苏士文是我大学时的老师，对我的情况较熟。我工作实习时住在麻花发射台宿舍，苏士文住在浏海胡同，相距较近，经常有来往。后来我到电波研究所工作，苏士文同志曾到什坊院村看我，并且开始向我布置任务。1948年2月，苏士文同志约我去他家，要我了解北平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在北平转播台的设置情况。我先后将搜集到的有关北平广播电台播音室、增音室以及麻花发射台、黄村收信台、双桥发射台等处的组织机构、设置情况、工作人员状况和这些部门的政治、业务、管理等情况写成书面材料交给了苏士文同志，苏士文又将这些材料及时交联络员伍伯骕同志（化名马华），由他转给地下党组织。

1948年8月，人民解放军已逼近通县箭杆河一带，北平四周已为解放军所控制。苏士文同志向我转达了北平地下党布置的保护电台设备、准备斗争、迎接解放的重要任务。10月间，西郊观测台里示波器上的变压器被烧坏，我带进城修理，修好后已出不了城，因为解放军正在进攻西郊“新北京”和莲花池一带，傅作义军队退驻城内，城门已关闭，西郊观测台也随之关闭，所有工作人员均进城在家等待。一日，苏士文同志通知我与他一起去鲁迅故居见矫庸同志，在那里他详谈了护台斗争任务，并且安排我会见了北平电台工作人员高子英同志，以便在国民党撤退时能够相互配合完成保护电台的任务。此后，苏士文和矫庸同志成了我的领导人，当时党的地下工作非常隐蔽，上下级都是通过单线联系，有事单独通知。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在地下党领导下有132人保护91部重点电台，在北平广播电台属于矫庸同志直接领导的有4人。

为了完成北平地下党组织交给我的护台任务，我必须要以合法身份出入北平广播电台（位于西长安街3号），于是我通过当时在北平广播电台增音室工作的育英中学同学陈起璞以及苏士文同志介绍的北平广播电台工务科科长郑观森的关系，被安排在增音室作一名替班技术员，从此取得了北平广播电台的合法身份。

那时 南京国民党政府已经无力向北平广播电台拨付经费 电台发不出工资，职工怨言较大。与此同时，北平电信局三千名职工掀起了震动全国的“饿工”斗争，电讯中断，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惊慌，不得不向工人妥协让步。矫庸同志根据当时的情况向我部署了配合全国性“反饥饿”斗争的任务。我按照矫庸同志的指示，在同事中做鼓动工作，建议停开台长的小汽车，以便节省费用为职工们发薪水。当时增音室的技术员陆生庠采纳了我的建议，关上了电台的大门，将台长的小汽车挡住，台长因此抱病在家，电台的日常工作由副台长主持，但他也不敢再坐小汽车上班。在职工们的强烈要求下，电台不得不给每人发了一台收音机作为对工资的补偿。

1948年冬，解放军已压近北平城，苏士文同志和矫庸同志根据城工部关于作好两手准备的指示，向我布置了保护电台的具体任务：一、准备夺取枪支，武装电台人员。我按照吩咐将电台内枪支弹药的数量以及分布情况做了详细的了解，然后向苏、矫两位同志做了汇报。二、根据矫庸同志的要求，分别给电台里的军统代表边某及中统代表冯某某各写一封警告信，陈述利害关系，命令他们不许破坏电台设备，否则将受到人民的惩罚。信由我草拟，然后由高子英同志找人抄写，信寄出去不久二人即逃之夭夭。三、安排专人保护机器设备。为了确保电台正常播音，以便解放军围城期间能听到城中消息，准确分析情况，并且北平一旦解放，全市人民可以立即收听到共产党的声音，我按照矫庸同志的要求，说服了新上任的工务科科长同意在增音室安装一台小型发电机。这样，即使北平发电厂万一遭到敌人破坏而断电，电台的播音照样

可以正常进行。

1949年1月31日晚8点钟，军代表李伍、黄云、李志海、康普等同志进驻北平广播电台，晚上9点钟，通过广播向全世界宣告：北平和平解放，北平广播电台奉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之命，即刻停止广播。我于当天晚上向李伍同志汇报了护台斗争的情况，李伍同志的工作很繁忙，但他在听取我的汇报时态度非常认真，听完我的汇报后已是深夜，此时城里已经戒严，李伍同志专门派了一辆吉普车，由李志海同志亲自送我回麻花电台宿舍。第二天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徐迈进同志宣布正式接管北平广播电台，认为电台完好无损。至此，我完成了地下党交给我的保护电台的任务。

北平获得和平解放后，北平广播电台改成新华广播电台，并于1949年2月2日上午开始播音。我被安排在业务处（后改成无线电总管理处）做技术工作，处长是陆亘一同志。此后几个月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和整顿电台的工作秩序，为全国的解放进行宣传服务。

9月下旬的一天，负责电台技术部门工作的李伍同志和黄云同志派我和陈起璞、杨继田等几位技术人员到天安门上安装两台美军军用250瓦大功率扩大机，扩大机安装在城楼大厅内的大石台上，石台高约1米，四周距墙壁的距离约1.5米，引出的两个喇叭分别安装在城楼上的东西两侧。这种扩大机俗称“九头鸟”，其形状为后面呈正方形盒状，前面带着九个号筒型喇叭，纵横三行排列，它的特点是功率大，可使声音定向，将四周的声音集中到前方。虽然李伍同志没有告诉我们做何目的，但我当时已预感到这几日将有一次重要的活动。果然，9月底李伍同志通知我说，10月1日将举行开国大典，要求我与其他几位同志负责监护新华门和天安门上的扩大机。接受这一重任后，我激动得几乎彻夜未眠，我认为这是党对我作为一名革命工作者政治上的完全信任和业务上的充分肯定。

第二天（即 10 月 1 日）一大早我接受安排先来到新华门城楼上监护扩大机。那天播音系统的规模相当大，从东单到西单都安上了扩大机，不过大都是小型扩大机，由新华广播电台服务部的同志管理。尽管监护扩大机这项工作并不复杂，但我内心还是感到很紧张，悉心查验每一处零件，丝毫不敢松懈。那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保证播音系统的万无一失。大约上午 10 点钟我被通知立即去天安门城楼，因为那里的扩大机上有一处小零件破损严重，需要马上修理。接到任务后我立刻骑车去电台取零件。当时长安街已经戒严，没有任何车辆通行，天安门广场上已挤满了前来参加开国大典的各界代表和群众，我在街上骑行时更加感觉这次活动的庄严和隆重。扩大机修好后已是中午时分，当时城楼上所有的工作人员均不得随意走动，这里的扩大机由我和陈起璞二人负责，李志海同志负责主宾台上的麦克风。下午 3 时许，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陆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记得当时毛主席身着深灰色的中山装，头戴一顶深灰色的八角帽，其他领导人也大都穿着中山装。那天的播音员是齐越和丁一岚同志。当毛泽东主席站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广场上 30 万群众顿时热烈欢呼，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虽然事隔半个世纪了，每每想起，仍如同昨日。在建国 50 周年之际，特写下这篇回忆文章献给那些为北京和平解放做过贡献的人们，愿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作者简介：徐树滋，建设部综合勘察研究设计院高级工程师。

开国纪念章唤起的回忆

· 刘向勃 ·

这枚标有“1949.10.1”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纪念”章，伴随着我历经了时代的风风雨雨，在身边已珍藏了50个年头。我在时隔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望到它，当年开国大典举



开国纪念章

行前后的许多往事，便会立即清晰地浮现到眼前。

1949年，我在北平市人民政府新闻处工作。

起初我们北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直属的各个处和市属的一些局设在府右街（解放前北平市政府的旧址）。这年9月，为了给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提供办公处所，大院里所有市级单位全部搬出，市府直属各处迁到西长安街二号，其它的局则分别迁到东西城。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亲手升起我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当天，白底黑字宋体竖写的“中央人民政府”牌匾即在中南海新华门内迎门的影壁上挂出，政务院的牌匾则挂在了（西花厅迤南）府右街北口路东——前北平市人民政府的大门处。

北平解放后，在天安门前举行人数以数十万计的各界群众大会，是从1949年7月7日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联合举行的“纪念七七大”开始的（在此之前，天安门城楼前面北平从没有举行过数以十万计的群众集会）这是一次纪念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十二周年并庆祝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的盛大集会，预示了新中国的即将诞生。7月7日，纪念大会原订下午3点开始，临近开会时突然获悉国民党飞机前来空袭的情报，大会决定停开，群众进行疏散。这时聚集在天安门前举着红旗、扛着横幅、敲着锣鼓的群众队伍相继撤离会场向东西长安街和南面的前门三个方向散去。由于缺少举行这样大规模活动的经验，这天事先又未在会场外的路口设置疏散指挥，一个小时过去东西长安街及附近的胡同里仍聚集着不少未疏散走的群众。这时，天安门城楼上的扩音器传来大会继续举行的通知，未疏散远的群众闻讯立即掉头返回天安门会场原来指定的位置。大会二次集合完毕已是晚上7点多钟，开会不久天上便降下瓢泼大雨。参加大会的20万群众饿着肚子、头顶着一阵紧一阵慢的雨水，站立在天安门前马路南侧千步廊的树林里，任雨水顺着每人的脸颊、脖颈、衣襟、裤脚流到地

上，聚精会神地聆听着天安门城楼上每一位代表的发言。这天的大会直开到午夜方才结束，我们单位离会场最近，在府右街南口，回到宿舍拧干浸透雨水的衣裤，已是凌晨两点多钟。

有了这次大会的经验和做了充分的组织准备，10月1日开国大典那天，大会总指挥部在天安门前的东、西两个三座门和会场南端的中华门等几个入口处均设立了分指挥部，负责引导前来参加大会的队伍入场，并把队伍带到场内指定的位置。我所在的北平市人民政府直属机关，由李化民同志任分指挥，率领各个处的青年干部三十余人佩戴着印有“纠察”字样的红布胸章把守在西三座门入口。所谓分指挥部，仅有临时从中山公园借来的几张方桌，掇起来权作指挥台。指挥人员站在桌子上面用手里拿着纸板弯成的话筒喊话。分指挥部连一台必需的电话也没有，和大会总指挥部的联络全靠我们这些小伙子的两条腿跑来跑去。

是日，大会在中山公园门前金水河南侧设立了一座供中外贵宾观礼的看台，包括看台两端的上下扶梯，全部是请北京的棚匠用杉篙木板搭成的，周围又用彩条布把杉篙遮盖装饰起来。除此之外，为开国大典准备的另一项设施，就是坐落在广场北端、正对天安门中央刚刚竖起的三十多米高的金顶银白色的旗杆，和在旗杆下汉白玉石须弥座内新埋设的一条通往天安门城楼的地下电缆。为了大典时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即可亲手升起广场旗杆上的五星红旗，特在城楼上设了一个扳动开关。

新竖起的旗杆是用下粗上细的铁管连接焊成。但当9月30日下午旗杆试用时，旗子升到顶端后，不料绞到钢丝绳里退不下来。这时为油漆旗杆搭起的脚手架早已拆除，重新搭起已来不及，叫来消防大队的云梯高度也够不到，这时距次日开国大典上毛主席亲手升旗仅有十几个小时，真是火烧眉毛。大家伫立在周围，仰着头眼巴巴地望着旗杆顶端，谁也想不出好办法。忽然人群中有人说，通县有个棚匠（记不太准，可能叫“小辫刘”）是攀高的能人，他可以爬上这么高的旗杆。随后筹备会立即派车接来这位能

人。据说他来后没费吹灰之力，借着灯光很快就爬到旗杆顶端，轻而易举地解开了绞在钢丝绳上面的死扣，这样才保证了第二天旗杆的使用。可惜事后没能及时追访这位登高英雄，只好在这里为他留下一点追忆。

开国大典的另一项准备工作，是在广场南端置放一块大约一立方米大小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石。为纪念自1840年以来为我国革命事业英勇牺牲的先烈们，新中国将在天安门对面树起一座丰碑——人民英雄纪念碑。开国大典的头一天——1949年9月30日晚7时左右，毛主席来到了广场，亲手挥锹为人民英雄纪念碑破土奠基，随后他又为纪念碑题写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准备镌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1952年8月1日正式动工兴建，1958年5月1日落成）的碑身正面上。

开国大典是在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举行的。（从1950年起每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和十一国庆节游行一律改到上午10时开始。）这天我被指派在西三座门的分指挥部担任“纠察”。上午7点钟吃过早饭，我们就赶到中山公园门前进入了岗位。这时，已有不少队伍举着红旗，打着横幅，敲着锣鼓从四面八方向会场走来。这一天，我们三十多个担任“纠察”的同志，从清晨到岗，直站到大典结束，很晚才回到机关。在会场内没吃饭，没喝水，喉咙都喊哑，两腿一刻也没拾闲，但却没有人感到一丝疲倦。我直到午夜躺在床上还久久不能入睡，仍沉浸在白日天安门开国大典的兴奋之中，为自己今生有幸参加新中国诞生的盛典而自豪。以后连续两年的“五一”和“十一”，我又幸运地被抽调到天安门大会筹备会宣传部的新闻处服务，有机会亲眼目睹了天安门广场每一年的新变化，观看到建国初期一年比一年更加绚丽的形形色色的游行彩车、一次比一次更加威武的人民解放军的队列，和那望着天安门城楼舍不得离去的浩浩荡荡的群众游行队伍，从而深深地感受到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日益走向繁荣富强！

这也正是历时50年，特别是能以闯过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

我将这枚开国纪念章珍藏到今天，并决心将它作为“传家宝”交给我的儿子、孙子，世世代代传下去的力量源泉所在。

这枚直径 16 毫米，顶端是五星红旗，下面是华表和天安门城楼图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纪念”章，是开国大典后颁发给我们参加大会服务的人员留作纪念的。据筹备会经手制作纪念章的夏允恭同志对我说，纪念章制作的枚数不多，只送给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中央领导同志每人一枚，其次就是为大典服务的部分同志，估计制作量两千枚左右。他还说纪念章是当时设在北池子的人民美术工作室的工厂承做的，筹备会还特为纪念章制作批给工厂二两黄金做原料。50 年过去了，我想它的含金量已远远不止是当初的那一点点；随着我们共和国的成长、壮大，体现在这枚纪念章上的含金量每天都在不断地增长着。

作者简介：刘向勃，农业部离休干部。

中国评剧院近五十年发展轨迹

· 张 玮 冯 霞 ·

前 言

中国评剧院是我们工作了四十多年的地方，我们是在这个有追求、有实力、有拼劲的创作集体中得到锻炼，在它温馨的怀抱中成长起来的评剧导演工作者。我们永远怀念那些日日夜夜共同战斗在排演场、大众剧场、厂矿车间、田头地里的老领导、老同志、老伙伴们，永远牢记着为人民服务、为发展新评戏而立下的“永生拼搏”的誓言。

曾作为全国“十面红旗剧团”之一的中国评剧院走过了它近五十年的艰难历程。它拥有上百出的上演剧目、众多的评剧明星和一个特别能战斗的创作班子，而尤为可贵的是，它拥有成千上万的北京观众。我们永远记得，那时每到鲜鱼口，远远地望着我们的大众剧场的霓虹灯亮着“满座——满、满”时的兴奋劲儿；我们也永远记得上

一出新戏，看到剧场门前排着长龙一样的队伍、抱着衣被等待天亮买票的观众时的无比自豪感。每当这时，我们就暗中给自己鼓劲，一定要提高戏的演出质量，以回报可爱的观众。那时我们天天泡在剧场和观众一起看戏，体验观众的心声，为观众的热情所感动，也有时因观众的冷落而酸心地落泪。我们高兴过，也伤心过，我们与剧院风雨同舟，一干就是一辈子。

1953年，民营的新中华评剧团（以小白玉霜、喜彩莲为主演）和军委解放评剧团（以新凤霞为主演）合并，成立了由中国戏曲研究院领导的中国评剧团。1955年正式成立中国评剧院，直属中央文化部。1958年，又有民营公助的北京市评剧团（以李忆兰、花同仙、袁凤霞为主演）合并到中国评剧院，同时剧院归属北京市领导，直到现在。

这个剧院一诞生就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立刻配备了全套艺术干部。于是以胡沙、胡斌为首的编剧、导演、音乐、舞美人员浩浩荡荡开进了中国评剧团。这些创作干部也是来自五湖四海，有的来自革命圣地延安，有的来自东北与晋冀鲁豫解放区。随后又有一些名牌大学的大学生参加进来，增添了剧院的创作力量。

中国评剧院是在旧剧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怎样在这块古玉上雕出精美的花朵，是摆在全体人员面前的新任务。大家在薛恩厚这位德高望重又非常熟悉戏曲规律的领导人带领下，开始了一系列的新探索。从旧剧团到新剧院，最大的变化是净化了舞台形象，使低级趣味的内容在舞台上绝迹。

剧院有明确的方针任务，有具体的创作计划、周密的训练计划及生产经营计划。它在创作上的原则是：注重生活，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结合的创作方法，对待传统剧目，注重“推陈出新”，发展现代新评戏，创作新人物。剧院还建立了导演制度。这样一个新兴的剧院，一经成立就爆发出了巨大的生命力。在五六十年代，曾经一年演出七百多场，在大众剧场有过一天连演四场戏的纪录（如《爱用辫子的姑娘》），真是红火极了。那时

剧院的年收入高达四十多万，不仅自给自足，还上缴了大量利润。1960 年剧院还自费创办了学员班，现在活跃在舞台上的骨干力量就是那时培育出来的。这些难忘的辉煌，是全院演职人员，日日夜夜在排演场上、打字室里、伙房里、剧场里、制作间里拼搏出来的。我们二人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满朝气的幸福大家庭中成长起来的。我们虽然没排出什么“精品”的戏来，可是从未偷过懒，我们问心无愧。

正当我们在戏曲的海洋中，刚刚学会游泳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国大地，它如洪魔般肆虐，剧院遭到了灭顶之灾。“文革”夺去了我们创作的大好年华，断送了几代人的舞台青春，摧毁了我们这个创作集体。而尤为惨重的损失，莫过于小白玉霜被迫害致死，新凤霞被迫害致残。面对无情的浩劫，我们擦干眼泪，还得挺起胸来干，干下去！我们坚信后来者们，在北京这块评剧的福地上，一定会干得更出色，创造出更加灿烂的评剧之花的。

与时代同步 与人民同心

剧院的剧目生产方针是“三并举”——传统戏、新编历史戏、现代戏并举，以现代戏为主。这一方针得到全院同志的认同与坚决贯彻。说实在的，我们投身评剧是因为它的方针深深地吸引了我们。

评剧具有表现现代生活的传统。早在 30 年代初，李金顺、李银顺就主演了以反对日本侵略为题材的《爱国娇》；筱桂花主演的《马振华投江》，是萧军的作品，她们的演出轰动了东北三省。土生土长的评剧大家成兆才创作的《杨三姐告状》，曾震惊了官府，竟遭到禁演。《杨三姐告状》可以说是评戏现代戏的开山之作，至今仍是评剧最优秀的保留剧目。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评剧现代戏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如东北评剧团韩少云主演的《小女